

問學集

W E N X U E J I

王向清 著



湘潭大學出版社

本书获湖南省重点学科——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学科资助

問學集

W E N X U E J I

王向清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学集 / 王向清著.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1128-189-7

I. ①问…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1299 号

问学集

王向清 著

责任编辑: 石 松

设 计: 张 毅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189-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序

向清教授是一位难得的大学老师。无论教学、科研抑或院所的管理工作，都是难以挑剔的。特别是对学生的关爱，更是令人感动。我常以“用力、用心、用精”这“三用”要求自己 and 谕勉学生，亦试图将“听雨轩”更为“三用书屋”，但比起向清来，自觉逊色得多。

我校是一所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它要求教员既要教书育人，同时亦需相应的研究成果服务社会 and 推动社会。向清正是基于这样的职业要求而勤于笔耕的，并且成果累累，先后写出《逻辑趣语》、《〈孙子兵法〉辩证思维研究》、《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几部著作，社会反响亦佳。近日，一本三十余万言的《问学集》又得以结集，并嘱我写几句作为序言。

向清治学大体上走的是诠释之路。研究先秦逻辑、《孙子兵法》是如此，探索近人毛泽东和冯契亦为如此。诠释有两种，一种是“乾嘉”含义上的，一种是“公羊”含义上的。前者为“我注六经”，后者为“六经注我”。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术语，这二者大致相当于所谓的“汉学”与“宋学”。而向清的学问，兼二者而有之。窃认为，这是一条亦然的 and 健康的学术之路。既可通过诠释光大传统学价值，又可结合现代需要而从传统中吸取有益的资源。同时，亦唯有这样的研究进路，才可真正避免学术的偏颇。

《问学集》分四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实乃传统哲学的现代应用），分别为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先秦哲学思想研究、湘学与近代哲学研究。这四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向清教授多年来学术探索的

全过程。从形式上看，四个部分似乎有些脱节，但从内容乃至一个学者之探索规律看，却又是紧密相联的。一个试图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如果对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哲学没有很好的认识，是说不出来多少道道的。反过来说，正因为向清对先秦哲学作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探索，所以他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才使人觉得有特色有深度。或言之，从先秦的老子、孙子，到近代的魏源、郭嵩焘，再到 20 世纪的毛泽东、冯契，作为研究客体而言，此乃是一条自然而然的学术进路。

不过，在向清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冯契研究。冯契先生是 20 世纪很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学术思想很有个性。他既不同于前辈学者如李达、艾思奇等人，重于宣传而欠于研究，亦别于与他同时或后辈的许多学者，固守教条而无创新。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尤其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可谓百家争鸣，百舸竞帆。但诸多流派诸多思想又都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题目展开的。答案各种各样，有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有自由主义学者的“充分西方化”，有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版”。我们虽不能说，相比于这形形色色的主义或主张，冯契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但冯契先生有两点则是开先例的好。第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借取中国传统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试图构建以“智慧”说为核心的具有现代意味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二，以往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进行的。而在中国，是冯契先生首先将心性问题、真善美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中，从而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一种既别于传统儒释道又异于现代西方的人生价值学说。

向清教授正是因为看到了冯契先生重大的学术贡献，才发愿将其发扬光大，以利当下中国的健康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层面”。所谓的两个层面，即“实践层面”和“学术层面”。此种区分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无疑是一种大思路，而且也是非常精到的。循着这一大思路再来看 20 世纪的中国，或许会引出更多的新思路与新

见解。

向清是冯契先生的学生，其对先生的研究，诚如他自己在《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后记”所言：“作为他的学生，能有机会将先生的哲学思想介绍给学术界，是我莫大的荣幸。”实际上，师门的光大，于生于师都是幸事。学生可以师门的光大而荣幸；作为老师，门下有光大师说的学生，更是一件荣幸的事情。孔子歿后，如果没有弟子们的结集而有《论语》，便不会作为“万世师表”而享有殊荣；释迦牟尼歿后，如果没有弟子们的结集，恐怕连佛教都没有，更谈不上“佛祖”之誉。但是，古今学术却又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者往往只注重研究对象的正值，对其学理的欠缺处，则很少留意。这倒不是为尊者讳而有意为之，而是研究者之心理使然。既然某一研究对象值得自己花大力气去研究，那么他所诠释的也就自然是那些在他自己看来为精妙的东西。就冯契研究而言，向清教授同样没有避免这一点。冯先生的哲学自成体系，精见亦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再无商榷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转识成智”，由培养真善美、知情意相统一的理想人格而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恐怕就多少带有一些精神乌托邦的色彩。关于这一点，我想向清也是明晓的，可能只是尚未发表而已。

问题无涯，研究无穷，吾国尤甚。愿与向清教授共勉。

启 良

2009年12月22日

目 录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 冯契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 /3
- 冯契对人的本质的新见解/31
- 论冯契的理想学说/40
-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60
- 冯契的具体真理学说/69
- 冯契对休谟问题的解答/79
- 冯契的自由学说及其理论意义/91
- 疑问:冯契认识论的重要范畴/102
- 意见:冯契认识论的重要范畴/109
- 冯契的抽象理论解读/117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131
- 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新人理想人格学说/142
- 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发展/154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亟待解决的问题/16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辨析/167
- 毛泽东关于人的个性解放理论及其现代价值/178
- 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189
-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202

先秦哲学思想研究

《老子》辩证的祸福观及现代启迪/221

论《孙子兵法》的主要范畴/227

再论《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234

论《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241

“君命有所不受”与实事求是/248

湘学与近代哲学研究

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湘学的开端/257

魏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290

承旧与开新:王闿运在近代湖湘学派中的地位/299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启蒙意蕴/306

王国维紧张人生解读/317

激进的庸俗进化论及其流变/327

管理学研究

蒙昧决策及其防范方略/339

决策失效简论/348

容人之短与用人之长/353

矫枉未必过正/359

后 记/364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

冯契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契（1915—1995），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在哲学元理论方面，冯契留下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本著作，建构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阐明了人类的认识怎样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矛盾运动。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冯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中西，兼容百家，撰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哲学史著作，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新的解读；在肯定中国近代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哲学革命。他不但在“为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在“为人”方面更是学术界的典范，真正做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一、“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建构

笔者在《“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一文中曾提到：冯契先生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在认识论的研究中找到由知识通往智慧的桥梁，超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① 学术界曾流行一种观点：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转向，再到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冯契不但肯定了哲学研究的这种演变过程，而且通过发掘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哲学史

^① 王向清：《“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第10～11页。

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大体是四个：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换一个提法就是：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换一个说法就是：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①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对上述四个问题探讨的重点存在差异：西方哲学史重点考察了前两个问题，而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探讨了后两个问题。在欧洲近代，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形而上学的思辨遭到不断抨击，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的各分支被分别地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导致二重性：一方面是一种进步，使得哲学各分支的研究更深入和系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局限性，产生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狭义认识论观点，主张认识论的范围限于研究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只探讨“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这两个问题，对它们的探讨是有意义的；而“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两个问题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不应为认识论所关注，对它们的研究是无意义的。在冯契看来，这是狭义的认识论观点。

冯契不赞成对认识论做狭义理解的观点，主张对认识论做广义的理解。广义认识论由无知到知、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构成，对知识如何上升为智慧即转识成智做了深入的探讨。对知识如何转化为智慧的考察是广义认识论的创新所在，因而广义认识论又被冠以“智慧”说的称谓。“智慧”说中由无知到知的飞跃与以往的认识论考察的内容是一致的，是能够为名言世界所把握的领域。“智慧”说中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探讨的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形而上的问题，属于超验知识的范畴，无法为名言世界所把握，只能为超名言世界所把握。后两个问题是以往的认识论所忽视的领域。

“智慧”说的哲学体系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部著作构成，前者是主干，后者是两翼。

作为“智慧”说的主干，《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主要通过认识论上四个问题的解答来阐明认识过程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回答了“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的问题。冯契援引了马克思主

①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

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不二”思想论证了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其二，阐述了“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冯契认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无论从人的认识能力还是从思维形式的角度来考察，都能够得到普遍有效的必然性知识。其三，在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冯契深入分析了认识过程中思维的矛盾运动，阐明了逻辑思维能够把握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宇宙的发展法则，也就是能把握具体真理。其四，冯契认为，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是能够培养的。哲学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不但要认识天道即世界，也要认识人性即自己；不但要改造世界，也要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主体在认识活动中把握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然后以这种认识推断未来，提出理想和奋斗目标。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主体不断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逐渐形成真善美、知情意统一的理想人格，造就自由的德性。

如上所述，前两个问题可以用名言世界去把握的；后两个问题不能为名言世界的知识把握，只能为超名言世界的智慧所把握。这就是说，由前两个领域的研究推进到后两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知识如何转化为智慧的难题。

“转识成智”是“智慧”说的核心范畴，集中体现了“智慧”说的创新，有必要作稍为详细的论述。冯契先生是从两个方面阐释转识成智的：

首先，知识通过飞跃可以转化为智慧。冯契认为，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的实践活动中，既凝结成了以求真、发现事实和条理等知识形态的纯科学，又获得了求穷通，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境界的哲学智慧。这表明知识可以飞跃为智慧。在他看来，主体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体现为连续性的中断和顿然实现的感觉。知识重分析和抽象，是对事物各个方面性质和属性的把握，而智慧是关于天道、人道根本原理的把握，这种认识是具体的、综合的。侧重分析的知识相加不等于智慧，“把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只有通过飞跃，才能顿然地全面、具体把握关于整体的认识。”^① 这就是说，知识只有通过飞跃才能转化为智慧。

其次，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是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实现的。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9 页。

理性的直觉是领悟，是在理性的照耀下给人以豁然贯通之感的直觉。在转识成智的过程中，理性的直觉是在理论思维领域中的豁然贯通而体验到无限、绝对的东西。在冯契看来，理性的直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渗透了理性的感性活动，是一下子把握到的主客观的统一，给人以顿悟和豁然贯通之感。理性的直觉并不神秘，大量存在于艺术、科学、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就哲学领域而言，理性的直觉探讨的是主体如何能够具体地、生动地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无限的形上之域。主体的认识活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限的，而哲学上的理性直觉揭示了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有条件中的无条件的东西。这种揭示往往是顿然之间实现的，是领悟。

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实现理性直觉的关键。冯契认为，恩格斯提出的“无限的前进运动”这一概念比较科学地回答了人们的认识活动能否把握绝对、无限、无条件的形上之域的问题。冯契指出，无限的前进运动包括了三个范畴：有限（相对的、有条件的），无限（绝对的、无条件的），无限前进运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过程）。从客观辩证法来说，物质运动是无限的，个别物体的运动是有限的，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展开为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过程。从认识的辩证法着眼，无限前进运动是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是在实践基础上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一致和百虑的反复、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知识一次次地达到矛盾的解决，从相对中揭示绝对，从有限中揭示无限，从有条件的东西中揭示无条件的，每一次揭示、每一次矛盾的解决都是飞跃。”^①基于此，他认为无限、绝对的天道以及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是在无限前进运动中逐步展开的，是人的理性直觉能把握的。理性的直觉是体现了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的直觉活动，是理性的观照和具体亲切的体验的统一。可以说，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理性的直觉不但不是神秘的，而且是只要善于捕捉就能获得的。

理性直觉的展开主要体现为“破”的方法与“立”的方法的辩证转化过程。“破和立不可分割，破就是破除对待，超越相对；立就是揭示绝对即在相对之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中，在相对者的联系、对立面的统一之中就有绝对。”^①冯契认为，破是必要的，因为要达到理性的直觉必须“去宥”或“解蔽”，只有超越是非，进而超越彼我界限、能所对待，才能把握性与天道；立更重要，因为破的目的是立，立是从肯定的方面把握对象世界。因此，强调破或立都是片面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此目的。就“破”的方面而言，冯契从庄子、郭象的见解中得到了启示，将理性直觉在破除是非、彼我、能所等知识经验领域中的种种对待，实现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上升过程中的方法，概括为三个密切联系、层层递进的“阶梯”。第一个阶梯是“分而齐之”，就是齐是非，超越各种意见的是非对待和各种对立观点的界限。第二个阶梯是“有而一之”，就是在存在主客、能所对立的情况下，破除外物的界限、大小、同异等种种差别而均齐如一地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第三个阶梯是“有而无之”，就是将天人内外、主客观、能知与所知种种差别超越了，达到旷然无累、超型脱相的境界。就“立”的方面而言，冯契肯定王夫之对老庄站在“静观”、“玄览”立场上宥于“破”的方法所造成的片面性提出了批评。王夫之认为老庄讲静观、玄览，并未真正体验到色、声、味等现象和见闻等感性活动的本原。在他看来，这些感性经验、感性活动是德性的体现，是天道、人道的具体化。冯契认同王夫之的观点，认为从本原上说，这些感性经验、感性活动源于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因而，一方面，理性的直觉作为渗透着理性的感性活动，并不是闭目塞听，而是既闻见又超乎闻见，把握性与天道；另一方面，理性的直觉并非像佛学、老庄那样以灭闻见为途径，而是凭闻见等感性活动以载道、显性，所把握的不是虚无、寂静的境界，而是生动活泼的实在之流，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

冯契指出，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求穷通的，哲学上的理性直觉也总是与辩证的结合、德性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换言之，理性的直觉与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不可分离。

辩证的综合是指在理性直觉过程中用多样性统一的范畴把握性与天道。在冯契看来，理性直觉所把握的是无限的天道、自由的德性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些是超名言之域，超知识经验的领域，是不可思议、不可用名言表达的。在名言之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8~429 页。

域中，言必有语词、语句等语言，知必有所待，要再现物我、能所的矛盾。但从名实关系说，名言、概念又总是将对象分割开来把握。换言之，名言之域中的概念、语言与其所反映的对象有一一对应的相对静止的关系。但理性的直觉把握的是不断变化的日新之流，是无对待的，是名言无法传达的。然而无法言语的领域还是要说。说不得的领域如何说？冯契认为庄子的卮言中体现的以差观之、以趣观之、以功观之的方法为人们如何言说说不得的超验领域提供了借鉴。在他看来，当庄子凭卮言把握对象世界时，一般的概念就演变为齐万物的达名。达名所表示的就是哲学范畴，可以运用于天地万物，如物、性、时、空、类、故、理等。达名表现了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所有这些以达名表示的范畴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大全、宇宙、天道；而大全、宇宙、天道是囊括万有、超越对待的总名。

冯契对总名和达名作了区分：达名是对最大事物类的反映，而总名表达的是元学的理念，是对宇宙整体的反映。达名是名言之域之名，受限制、概括等逻辑关系的制约；总名虽然称之为名，但实际上是说不得的，不是可名之名。对这个理性直觉所把握的无名的道，只能强为之名，也就是借用名去指称，实际上并不是名。冯契指出：我们现在用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本体、第一因、天道、大全等来称谓理性直觉所把握的实在之流或物质运动的长河，只不过是主体对它们的一种命名，是语言意上的名，而非概念意义上的名。总名之所以能称谓那些不可言说的领域，是与用达名表达的哲学范畴的多样性统一相联系的。达名所表示的概念、范畴，其多样性的统一是辩证的综合，这就可以用总名来称呼。比如，人们在把握宇宙洪流时，就要运用时空这一达名，而讲时空这一达名又是通过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等辩证的综合实现的。在冯契看来，用达名所表示的范畴之间的辩证综合来表示的概念是元学的理念，元学的理念有其涵义。“理念是关于总体的具体范畴，要用理性直觉来把握，用辩证的综合来表达的。”^①

要在理性的直觉中实现辩证的综合，还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在冯契看来，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从感性具体上升为思维中的抽象，再从思维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中的抽象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总是先把握对象这样那样的属性、运动状态和变化规律，形成的概念是抽象的。从感性具体上升为思维中的抽象，就是从这样那样的方面揭示一定领域的变化规律，体现出分析的特征。方方面面的认识积累多了，到了一定程度，认识就会从思维中的抽象上升为具体，把已经发现的规律、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辩证的综合，从而把握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二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冯契指出，理性直觉中实现的辩证综合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具体真理。“既然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有条件的，有局限性的。历史向前发展了，条件改变了，原来达到的具体结论又有待发展，要发生分化，于是又要经历一致化百虑、百虑归于一致的辩证运动。”^① 这就是说，不能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辩证的综合绝对化、教条化，而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冯契主张哲学研究一定要做到辩证的综合。在他看来，哲学研究只有在批判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新的探索和新的创造，从而推动哲学理论向前发展。他非常欣赏黑格尔说过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被推翻了，但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哲学体系被推翻，因为推翻一个哲学体系就是克服其体系形式，而把它降低为一个从属的原理，包含在自己新的体系里面了。冯契指出，任何新的哲学体系的建立，总是既提出了新的思想，又分析批判了先哲的相关成果，克服了旧的体系，同时将其合理成分包含在自己新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辩证的综合。哲学凭理性的直觉把握性与天道，总是通过对哲学传统的辩证综合来表达和论证。

上述见解无疑是非常精辟的，哲学研究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全新意义的哲学创造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必须以先哲提供的思想材料为出发点。冯契不但在理论上主张哲学研究应做到辩证的综合，而且将这种理论真正付诸了实践，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花毕生心血建构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积极因素，采借了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实现了“三流合一”，是真正的辩证的综合。正因为如

①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